

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

——污名的交互与再生

高一飞◎著

STIGMA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

——污名的交互与再生

周—飞等著

STIGMA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疾病污名与社会身份污名的交互关系研究——以农民工‘艾滋病高危人群’污名为例”项目（12YJCZH056）成果

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 ——污名的交互与再生

Migrant Workers and HIV/AIDS:
Reproduction and Interaction of Stigmas

高一飞◎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 污名的交互与再生 / 高一飞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22-17148-0

I. ①人… II. ①高… III. ①人口流动—关系—获得性免疫缺陷
综合征—研究—中国 IV. ①R51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31298 号

责任编辑: 赵 红 陶汝昌

责任校对: 任 娜

责任印制: 代隆参

装帧设计: 李 昱

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污名的交互与再生

Migrant Workers and HIV/AIDS: Reproduction and Interaction of Stigmas

高一飞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30千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天彩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7148-0
定价 48.00元



云南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如需购买图书、反馈意见, 请与我社联系

总编室: 0871-64109126 发行部: 0871-64108507 审校部: 0871-64164626 印制部: 0871-641915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危险的污名与污名的危险

邓启耀

本书作者所探讨的，是几个敏感问题的叠加：艾滋病、人口流动、污名。

这样沉重的选题，与作者娇小的身体，很不协调。但如果认识这个人，知道她的经历，也许会有些刮目相看。她之前学的是工商管理，据她说是因为读了我的《中国巫蛊考察》，从热门专业转考冷门的人类学，成为我2005级的博士研究生。她的学位论文选择研究艾滋病的污名问题，我的巫蛊研究面对的是被污名化的亚文化群体，对象不同，问题相同。她的艾滋病研究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问题，我的巫蛊研究面对的也不仅仅是民俗问题；她的理论支撑点是人类学和公共卫生学，我的理论支撑点是人类学和跨文化精神病学。我们都和医学及公共卫生领域的朋友有过合作互动。所以，在她准备做艾滋病污名问题的研究，我们讨论的时候，也不至于太隔。

另外，应该提及的还有昆明医学院的公共卫生领域专家张开宁教授。开宁在20世纪90年代发起组织了一个“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倡导跨学科合作。筹建时，开宁来拉我入伙，介绍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的新医学模式。这个新医学模式认为，健康与疾病问题，不仅仅是生理病理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所以，面对及处理健康和疾病的问题，需要多学科的协调合作。那些年，研究会在开宁的领导下，做得风生水起，具有很好的国际影响。我到中山大学之后，开宁希望把合作延伸下去，所以我在中山大学成立了一个“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延续与云南同仁跨地区合作。高一飞由此成为我和开宁共同指导的学生之一，她也有机会参加了开宁和我主持的一些研究项目。本书的初期调查，大约始于这个机缘。

我和开宁都是在滇西中缅边境生活多年的知青，同属“被流动”到边疆的低

端人口，对那里的跨界族群、毒品交易等有所认知。回城后多次还乡，第二故乡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复苏令我们开心，悄悄滋生的吸毒、艾滋病等传闻让我们担忧。我们无法改变这一切，只有力所能及做一点分内的事。作为公共卫生学的专家，开宁带着学生们做了不少实际工作。在这个团队中，高一飞人小压秤砣，在别人视为畏途的地方来来去去，师门内给她的绰号是“小超人”。她花了几年工夫，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又花几年工夫，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支持下，完成了她的这部著作。算下来，关于流动人口的疾病污名和身份污名的调查和研究，她坚持做十余年了。

疾病污名和身份污名是本书的切入点，但污名化他者，却是人类社会古今中外存在的普遍现象。从日常性污名到极端化污名，从个人的污名到群体性污名，污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形式多样，无所不在。

遍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性污名，是散布一些丑化他人的流言蜚语，主要功能在于通过诬蔑他人，纾解由嫉妒、憎恨、文化差异等引起的心理问题。这种心理的社会化，很容易导致对某一群体的普遍性歧视甚至妖魔化。对外，把异域他国的族群视为虫兽、鬼佬、祸水；对内，划分贱民、低端人口、不可接触者，甚至人为制造异己分子、阶级敌人等假想敌，将污名极端化为危险的污名。

危险的污名，来源于对他者的刻板化印象和对未知危险的恐惧。即使在相对非人为操控的自然灾祸和疾病领域，寻找污名化表征和替罪羊，仍然是传统社会处理危机的一种手段。对于由此面对或推导出来的灾祸和疾病问题，传统的做法，一是隔离，例如对麻风病、精神病和一些疑难病症的处置；一是转嫁，例如把某类灾祸与病痛指控为放蛊、叫魂所致，从而对被指控者进行打压、流放和虐杀。所以，关于疾病的污名问题，其实还是个社会问题，文化心理问题。

随着现代社会对疾病认知和防治能力的提高，麻风病、精神病等疾病已经不再是让人望而生畏的绝症，放蛊、叫魂之类的说辞也被视为无稽之谈。但是，只要前面所说的社会心理存在，新的污名必将“再生”出来。本书讨论的关于艾滋病与身份污名的交互与再生，即是新时代衍生的污名。污名的形式不同，但在社会文化心理上，仍然与过去同构对应，甚至附加上了许多“危险”的副词——比如“高危行为”“高危性伴侣”“高危人群”以及传播疾病的种种“危险”因素，等等。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在某些人眼中已经被界定为“低端”的流动人口，那些为了谋生离乡背井、随高速公路修建而流动的农民工、性工作者和在跨境婚

姻中呈现不稳定状态的社区。由于这种叠加的流动性，农民工、长途汽车司机、商业性工作者和因跨国婚姻来自境外的媳妇等，被界定为艾滋病“高危人群”。这些居无定所的人们，成为疾病和身份双重“高危”污名建构的牺牲者。

本书的研究空间，是随高速公路延伸向境内外的社会空间。滇西境外，是臭名昭著的毒品发源地“金三角”地区，吸毒、跨境毒品走私和艾滋病成为这些地方谈虎色变的话题。对这些地方的刻板印象，衍生出对跨界人群的污名，似乎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作者围绕着与滇西高速建设有关的人口流动引发艾滋病风险的猜测，以及现实存在的艾滋病风险这些问题展开，重点放在与高速公路建设相关的显性和隐性艾滋病传播风险的探讨上。这些风险不仅显性地存在于流动务工人口中，也隐性地存在于滇西高速途经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文化特征多元的广大滇西农村地区，并呈现不同的状态。

本书的作者是人类学研究者，其专业训练要求她探讨这些污名形成的根源，关注污名形成过程中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看到社会身份污名与疾病污名的交互。这就在调查和研究时，不仅看到被污名的表象，而且深究产生污名并使其成为“危险”的内在结构。

我十分欣慰地看到，作者在长期的实地调查和与这些“流动人口”的接触中，对那些站在城里人（或者非流动人口）的立场，强调农民工很可能从事与艾滋病相关的高危行为，是一个威胁城市人健康和社会整体健康、传播疾病“危险”因素的流行看法，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反思；对于那些缺乏说服力的血清学数据、间接的知识调查数据、以偏概全的行为学数据、社会学的污名化想象、政策话语的含糊和媒体的放大及固化，以田野考察事实做了一定厘清。她注意到，农民工的弱势性与边缘性是我国社会体制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受冲击的产物，这种现实状况主要来自于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的各种歧视和社会隔离。她发现，一些常用的理论模型，由于把导致个人暴露于艾滋病感染风险的行为视为完全的个人选择，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的一些矛盾。同是流动人口，不同职业群体所面临的艾滋病的行为危险性与脆弱性各不相同。高危行为的发生，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情境、权力关系有关，必须把它放到特殊的社会文化场域和权力结构之中，具体分析各种群体之间的高危行为差异的深层次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原因。经过长达三年的调查和持续十余年的研究，一飞拿出了这个成果，体现了一个社会科学学者应有的素质和良知。

我特别高兴地看到，虽然限于写作框架和阅历，作者关注点主要在当前人口

流动与艾滋病风险及污名。但是，在她的问题意识中，已经在探究那个必将逻辑性延伸的问题：危险的污名，会不会转化为污名的危险？

最直接的危险，是污名化导致真实疾病扩散的危险。一些艾滋病感染者，迫于社会、家庭的巨大道德、舆论和心理压力，为了逃避污名而隐瞒病情。疾病不会因为匿“名”而消失，反而会因隐藏而坐“实”，使疾病具有了更加现实的传播危险。有的艾滋病患者甚至可能由于憎恨这种污名而选择报复社会，故意扩大感染，让更多的人陪同自己一起承受污名。考虑到这一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我们曾尝试过开宁主持的一个项目，把手机卡匿名发放给相关目标人群，让他们在需要时专卡专用，被咨询机构完全不知道咨询者的如何身份信息，充分尊重当事人隐私，使他们能够放心使用，及时获得相关知识和信息，及时应对，减少“隐私”变成“公害”的几率。

更深刻的危险，是污名造成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歧视和伤害。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一些思想者的警觉，如苏珊·桑塔格一针见血地指出：艾滋病污名与欧美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下各种社会张力相结合，关于艾滋病的想象往往与“非我”、异域、原始地区的“他者”联系在一起。美国和欧洲作为一种“优越文化体”一再保证“普通人口（异性恋的欧洲裔白人）”是安全的，艾滋病主要是黑人病、少数族裔病、同性恋病（苏珊·桑塔格，2003：152）。本书作者也意识到，每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差别，决定了与艾滋病污名产生交互的社会身份污名会有所不同。比如，在欧美，与其交互的是种族主义污名和殖民主义污名；在中国，它与转型期城乡二元结构张力下产生的具有社会阶层主义的农民工污名发生了交互。无论在哪种情境下，艾滋病污名都具有极强的文化敏感性，能自动“选择”反映该文化特点的社会身份污名进行交互。因此，它与社会身份污名的交互总是一种“本土化”的结合（见本书结语）。

疾病与身份的双重污名，会降低社会人道关怀的水准，削弱危机处理的力度，甚至可能演化为对被污名群体的公共歧视或社会化迫害。这种歧视或迫害，往往具有很强的自我优越感和意识形态色彩。如果它们形成一种社会意识并与权力或暴力结合，对他者污名化的最终危险，就是种族主义、纳粹主义和恐怖主义。这是历史和现实都一再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事实。

对于疾病污名的消除，始于我们对疾病的科学认知和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对于身份污名的消除，难度更大，但这是现代文明和谐社会必须迈出的那一步。

2017年12月于广州

自序

自从1981年美国发现并确诊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艾滋病的魔爪几乎凌虐了全球每一寸土地（UNAIDS，2006）。1989年，中国大陆确诊了第一例本土艾滋病病例，经历了近30年后，我国虽然仍属于低流行国家，但是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基数庞大，而且感染人数的增长呈急速上升趋势。截至2011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44.5万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7.4万例，死亡报告9.3万人。在这一数据基础上，我国政府、各学术单位和联合国有关机构估计我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8万，其中艾滋病病人15.4万人；据估计，仅2011年一年就发生新增感染4.8万例、艾滋病相关死亡2.8万例（UNAIDS，2012）。

几乎与艾滋病在中国扩散蔓延同一时期，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城乡二元结构的张力和改革开放大潮，转化成了强烈的推、拉力，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务工大潮。有人认为，流动人口是首当其冲受艾滋病侵害的群体；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艾滋病病毒在地理空间上沟通城乡、在社会空间上沟通高危人群和普通人群传播的载体。有研究者预测，中国要打好艾滋病应对之战，遏制艾滋病在过亿流动人口中的传播是关键。

2005~2007年，我参与了滇西某段高速公路（以下匿名简称为滇西高速）建设工地沿线艾滋病预防干预项目的评估调研，在筑路工地上开展现场调查，对由道路建设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有了深入了解。并有机会围绕由滇西高速建设引发的人口流动，在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框架下，在筑路工地周边的性工作者和社区中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通过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多种研究方法，在其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中剖析各个群体所面临的艾滋病风险，从多侧面、多层次综合观察公路沿途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的关系。

本书将呈现这项我倾注了三年多心血的研究，通过深描道路建设、人口流动

与艾滋病传播的复杂关系，以解析农民工“艾滋病高危人群”污名的性质。

本书的第一部分，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本书的背景。“研究缘起”，从启发本研究的“两个争论”开端，回顾了全球关于人口流动与艾滋病关系的不同观点，以及农民工是否为艾滋病高危人群的争论。问答这两个问题是本研究的目标，也是贯穿全书的线索。紧接着，“研究方法”部分介绍了我为解决和回答研究问题做出的方法论选择。第三个方面是田野选择，介绍了研究所选择的特殊田野及其特点。

第二部分，围绕着与滇西高速建设有关的人口流动引发的艾滋病风险猜测以及现实存在的艾滋病风险展开，重点放在与高速公路建设相关的显性和隐性艾滋病传播风险上。显性风险主要指工地人群与商业性性行为有关的性传播风险。随着公路建设开工，沿线的新建娱乐场所增多，商业性性工作者人数上升，一些性工作者甚至形成了跟着基建工程流动的从业习惯。而筑路工地人群中确实存在对商业性性服务的需求，在枯燥、缺乏娱乐、与家庭和固定性伴侣长期分离的工地生活中，寻求商业性性服务作为一种解决生理需求、满足心理需求、促进商业应酬的娱乐元素被合理化，工地各职业群体，都有一定比例从事商业性性行为，而且普遍存在侥幸心理与低估风险的倾向。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隐性风险是工地人群与周边村落艾滋病风险的传递与叠加。滇西高速途经广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文化特征多元的滇西农村地区，工地流动人口与周边艾滋病风险发生了多种联系。

第三部分，是在公路沿途三个不同类型村落的田野调查发现。如果说第二部分是概括地揭示了工地人群、性工作者和当地社区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三部分就是对概括分析的注解和补充，更生动地在情境和个案中还原了三个群体的关系。由于区位、社会文化和生计结构的不同，这三个村落各自具有独特的艾滋病性传播风险与疫情。在山区贫困村龙村，疫情与风险主要跟村民前往德宏等艾滋病高流行区的打工传统，以及村里特殊的跨境婚姻有关；在地处富饶坝区、农业发达的傣族世居村芒村，风险与疫情和当地“汉傣”文化中开放的婚前/婚外性行为有关；在靠近城镇经济中心的马村，风险与疫情受其高度发展的多元非农经济与快速城镇化的周边环境影响，主要与有序劳务输出有关。高速公路开工以后，三个村寨都与工地人群和新增性工作者产生了各具特点的互动。一方面，工地人员与村民的互动延续和加剧了村寨中原有的艾滋病风险；另一方面，工地人群、新增性工作者、周边村寨村民通过多种形式的多性伴行为连接到同一个“性

的社会网络”中，他们的风险也因此传递、叠加，产生出新的风险。

第四部分，结合田野发现与文献研究，回应了作为研究出发点的两个争论。关于艾滋病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在全景化地再现和总结与滇西高速建设工地人口流动相关的艾滋病风险的基础上，可以看到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之间至少存在三种关系：第一，同源性，即被相似甚至相同的社会张力和社会结构驱动；第二，直接相互作用，即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宏观、中观、微观因素会增加具体情境的艾滋病风险、社会易感性和脆弱性；第三，更微妙的间接相互影响与联系，即二者相互交织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效应，分别反作用于艾滋病防治与人口流动问题。关于农民工是“艾滋病高危人群”的说法，滇西高速工地人群的艾滋病风险分层现象是极好的驳斥，把农民工等同于艾滋病高危人群是一种污名化，这一污名的形成过程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是一种社会身份污名与疾病污名的交互。最后，这一部分还对相关的生物医学理论、医学人类学理论、艾滋病脆弱性模型进行了拓展讨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无专门注明，本书中所有涉及年龄、价格及货币数量的数据均为2006~2008年当时、当地水平，未做调整。出于伦理考量，书中有可能暴露感染者及报道人身份信息的人名、地名已做化名处理，涉及地名的史料、地图和参考文献也尽量隐去。

目 录

第一部分 背 景

第一章 研究缘起——两个争论·····	3
第一节 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有怎样的关系·····	3
第二节 农民工是否是艾滋病高危人群·····	5
第二章 研究方法·····	13
第一节 多点民族志·····	13
一、田野研究困境·····	13
二、多点民族志方法的尝试·····	14
第二节 定量与定性研究·····	15
一、定量调查·····	15
二、定性研究·····	17
第三章 流动的建设者·····	20
第一节 滇西高速筑路工地人群·····	20
一、项目部人员·····	20
二、监理·····	20
三、民工·····	21

第二节 滇西高速沿途社区·····	22
一、第一板块——隆城城区及周边乡镇·····	22
二、第二板块——江坝·····	23
三、第三板块——龙县山区·····	24
 第二部分 风险何在？——显性与隐性的风险	
第四章 与滇西高速公路相关的艾滋病风险推测·····	27
第一节 宏观政策环境·····	27
第二节 各种相关群体对滇西高速艾滋病风险的推断及行动·····	37
一、国际社会对修建滇西高速引发的人口流动及其相关艾滋病风险的推断 ·····	38
二、国际项目与地方政府达成的共识·····	39
三、村民与工地人群的看法·····	41
四、小结·····	42
第五章 显性的艾滋病风险·····	43
第一节 筑路工地周边的娱乐场所与性工作者·····	43
一、娱乐场所与性工作者的主要类型·····	43
二、跟随筑路工地人群流动的性工作者·····	47
三、性工作者的主要分布与规模·····	51
第二节 工地人群商业性性行为·····	54
一、筑路工地人群自述·····	54
二、工地文化对商业性行为和艾滋病风险的看法·····	60
三、工地各职业群体的商业性性行为——以 S 标为例·····	62

四、印证与补充——商业性工作者与工地人群的性关系·····	77
第三节 与显性风险相关的艾滋病疫情·····	79
第六章 隐性的艾滋病风险·····	81
第一节 滇西高速筑路工地沿线社区的艾滋病疫情·····	81
第二节 筑路工地与周边社区的互动与互识·····	85
一、互动·····	85
二、互识·····	87
第三节 周边社区中的艾滋病风险·····	93
一、与毒品相关的风险·····	93
二、当地社区中的商业性性行为·····	94
三、非商业性性行为与准商业性性行为：村民与工地人群的性关系·····	96
四、小结·····	98

第三部分 工地与周边社区——谁危害了谁

第七章 公路边的山区贫困村——龙村·····	101
第一节 明清戍边军人与流民的后代·····	101
第二节 交通要道旁的贫困农业村·····	105
一、萧条的路边经济·····	105
二、低微的农业收入与漫长的干冬农闲·····	106
第三节 前往缅甸、德宏的打工潮·····	112
一、到“里面”打工的传统·····	112
二、到“里面”打工的生活·····	114
三、不外出打工的龙村人·····	118
第四节 艾滋病与龙村·····	121

一、娶进了媳妇，带来了病·····	122
二、前往高流行区务工的多重风险·····	127
三、本地村民的风险：商业性性行为与非婚性行为·····	132
第五节 滇西高速开工——村里艾滋病风险的延续与变化·····	134
一、高速公路提供的就近打工机会·····	135
二、工地与当地社会的婚恋及性关系·····	137
三、工地带来新的艾滋病风险·····	139
四、相互传递的艾滋病风险·····	139
第六节 村民对艾滋病的认知与理解·····	142
一、“艾滋病”概念的传入与变化·····	142
二、几类加剧风险的认知与观念·····	144
三、继续发展中的艾滋病“地方知识”·····	146
第七节 小结·····	148
第八章 美丽富饶的坝区傣族村——芒村·····	149
第一节 芒村傣族与外来人口·····	149
一、芒村傣族·····	149
二、1949年之后芒村及周边地区的外来人口·····	153
第二节 以发达的亚热带农业为主的生计·····	156
一、优势自然条件下的多元化农业种植·····	157
二、外出打工、商业与运输业·····	166
第三节 芒村的民族文化·····	170
一、语言、文字、姓名·····	170
二、历法与节日·····	174
三、汉傣通婚·····	175
第四节 与外来人口和婚恋民俗文化有关的艾滋病风险·····	177

一、芒村的吸、贩毒情况·····	177
二、芒村的婚恋观·····	178
三、现实的艾滋病感染与传播·····	184
第五节 高速公路修建之后的新风险——新增性工作者与准商业性性行为 ·····	188
一、滇西高速与芒村·····	188
二、本地的性服务场所增加·····	190
三、村妇与工地人员的准商业性性行为·····	195
第六节 小结·····	196
 第九章 城镇经济辐射下的城边村——马村·····	198
第一节 土地资源紧缺的农业与多元发展的非农经济·····	199
一、土地资源紧缺的农业·····	199
二、多元化非农产业·····	203
第二节 城区周边乡村的高城镇化·····	215
一、高水平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	215
二、高度非农化的乡村人口·····	217
第三节 马村的艾滋病风险及其变化·····	219
一、与劳务输出地有关的风险·····	220
二、与隆城城区及国道有关的风险·····	222
三、与滇西高速有关的风险·····	225
第四节 小结·····	228

第四部分 结 语

第十章 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	231
第一节 与滇西高速工地人口流动有关的显性和隐性艾滋病风险·····	231

第二节 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的复杂关系·····	236
一、滇西高速建设个案中的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	236
二、人口流动与艾滋病“形影相随”的原因·····	237
三、当艾滋病传播遇上人口流动·····	240
第十一章 农民工的“艾滋病高危人群”污名·····	245
第一节 滇西高速个案——工地人群艾滋病风险分层·····	245
一、工地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艾滋病知识、危险行为的分层·····	245
二、基于这种分层的三点讨论·····	247
第二节 农民工的“艾滋病高危人群”污名形成·····	256
一、学术话语的主导作用·····	257
二、政策话语的慎重和含糊·····	258
三、舆论、媒体、国内和国际合作艾滋病防治项目的附和与放大·····	259
第三节 社会身份污名与疾病污名的交互·····	260
一、农民工“艾滋病高危人群”污名——社会身份污名与疾病污名的叠加 ·····	260
二、艾滋病污名与其他社会身份污名的交互作用·····	261
三、疾病污名与身份污名的交互特点·····	263
参考文献·····	267